

新中国外交舞台的

『将军大使』

□ 罗元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向国外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耿飚将军便是其中突出的一员。

中央突然来了调令：去外交部

1950年元旦后的一天上午，通讯员急匆匆地敲开了耿飚的办公室：“报告，耿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让您马上过去一下。”“好的。”耿飚正在埋头批阅一份报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一见面，政委李志民就兴奋地对耿飚说：“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什么？调我去干外交？”耿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反问了一句。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20多年来，一直是扛枪作战，现在已经打下了革命江山，还是要继续紧握枪杆子，保卫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做

梦也没有想到，中央会突然来调令。杨得志从耿飚的表情上，看出了他的心事，便亲切地劝道：“老耿，你还可以经常回兵团走娘家嘛！”作为老朋友，杨得志了解此刻耿飚的心情，他舍不得离开长期一起工作的战友，离不开长期一起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十九兵团的广大指战员。接着，杨得志又说：“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杨得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耿飚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不劝说，耿飚也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另外，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晚年在回忆起当初的想法时，耿飚这样说。春节一过，耿飚便来到了北京，带着妻子赵兰香和两岁的小女儿，一家人临时住进了北京隆福寺附近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很快，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告诉耿飚，周恩来总理要过来看望他。“总理这么忙，还专门过来看望我们？”耿飚心里异常兴奋。虽然与周恩来多年未见面了，但周恩来严谨、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令耿飚印象非常深刻。

早在1944年9月，耿飚奉命将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周恩来向耿飚详细交代了有关情况，就连如何行军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和布置，谆谆嘱咐犹仍在耳。“总理，您好！”一见周恩来，耿飚便轻声地叫了一声。“哦，耿副同志你来了！”周恩来亲切地问候道。“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详细地向耿飚讲述起新中国成立数月以来外交战线的形势，然后对耿飚说：“把你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面对这样的意外任命，耿飚感到惊讶。“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周恩来听出了耿飚的惊讶之意，便问道，“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不了解！”耿飚回答道，“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名。”“是啊！”周恩来对耿飚的回答感到满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出席大国（即联合国大会的简称）的准备。”周恩来认真地说。接着，他又问

耿飚：“你对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耿飚连忙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恩来笑了笑，“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在会议上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这次派你到联合国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耿飚心里非常感动。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对自己许多年以前的这些细节还记得这么清楚。但耿飚心里还是不踏实：“可是，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

“这些，都是慢慢学会的！”周恩来宽慰地说。接着，周恩来向耿飚谈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毛泽东主席对外交工作的指示精神，令耿飚茅塞顿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耿飚参加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筹备工作。在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的直接领导下，耿飚忘我地投入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之中。很快，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接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指导

就这样，耿飚和参加培训的其他人员一起，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住进饭店，耿飚觉得很不自在。客房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刚从军营出来的他感到很习惯。晚上睡在床上，整个身体好像陷在“坑”里似的，翻个身都要费很大的力，弄得整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但是，他必须适应这样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有一天，耿飚、赵兰香夫妇与大家一起，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和胡济邦老师的带领下，到北京饭店进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吃西餐。正在彩排中，周恩来走了过来，告诉大家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听到这个消息，耿飚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和毛泽东已有五六年未见面了，想不到毛泽东就在自己的身边……“喔，老乡来了！”毛泽东紧紧握着耿飚的手，满面春风。耿飚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湘

潭韶山相隔不远。1939年，耿飚的父亲到延安时，专门带着耿飚一起去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耿飚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接着，耿飚的父亲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家乡的情况。所以，后来毛泽东就称耿飚为“老乡”。

“听说你们不久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 and 你们谈一谈。”待耿飚等人坐下后，毛泽东与大家交谈起来：“你们是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都是从部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开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

这时，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对此，毛泽东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他还幽默地说：“我刚才说‘将军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喔，想起一件事，”毛泽东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向耿飚等谈到了要如何通过公开的途径，如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等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毛泽东抽了一口香烟，继续说道：“总之，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着耿飚，认真地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令耿飚终生难忘。学习班结束后，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由于当时中国与丹麦的建交谈判已取得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耿飚被宣布为驻瑞典王国大使后，兼任驻丹麦王国大使。第二年初，耿飚在瑞典又接到国内任命，再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大使。经过紧张的准备，耿飚踏上了前往异国的征程。（摘自2019年第8期《党史纵览》，原标题为《耿飚将军的大使岁月》）

彭德怀的“四个不准”

□ 王林育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担任党、政、军重要职务。他政务繁忙，经常外出视察。每次出发前，他都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四个不准”：一、每到一地，不准要求当地入接送；二、在任何地方吃饭，不准请客；三、不准要人家代买东西，如果送上门来，也要婉言谢绝；四、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

一次，彭德怀到杭州勘察钱塘江北岸。离开时，见有人往汽车上装绍兴酒，立即问参谋：“酒是哪来的？”工作人员说：“有买的，也有送的。”彭德怀生气地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见大家默不作声，他又大声问：“伙食费算了没有？”得知有的地方坚决不收伙食费，他更是怒容满面。直到当地领导表示回去一定算清，带走的酒都按市价付钱，带不走的退回去时，他才勉强息怒离开。

1956年夏日的一天，警卫员建议彭德怀到北海公园游览，还可到湖心亭看戏。彭德怀很高兴，他让汽车在离公园一条街的地方停下，可到门口一看，大牌子上写着“休息”二字，几个干部和工作人员在那里等候。原来，警卫员通知了有关部门，特地做了安排。彭德怀非常生气：“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工作人员解释，是奉了上级指示，闭园接待首长的。彭德怀气冲冲地说：“这么大一个公园，我

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绝不能有！”他转身走出公园，路上对警卫员说：“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娘！”生活中，彭德怀对自己很“小气”。衬衣打了好多补丁，还舍不得扔。他的一部旧式汽车，有关部门让换新的，他说：“这辆还能用，换什么？”窗帘布旧了，警卫员提出更换，他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做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

彭德怀对自己“小气”，对国家、对同志却是无私奉献。1954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干部子女都改由家庭负担学费。彭德怀的侄女是烈士子女，国家规定学费仍由学校供给。彭德怀却对侄女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他在学校来信上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他说：“现在国家还很困难，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们减轻国家一点负担也是应该的。”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侄女上学。（摘自201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长征路上的独腿将军钟赤兵

□ 金振蓉 李睿宸 张 青 孙云清

娄山关战斗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娄山关地势险峻，群峰如剑，在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红军的英勇顽强从钟赤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带伤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事后，医生发现他被子弹击中的腿部骨头都被扭碎了。当时红军医院没有医疗条件，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就靠砍柴刀和锯子完成了三个多小时的截肢手术，但术后不久伤口感染了，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过后，伤口再度感染，第三次

时，手术医生从大腿根部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他坚决不同意留下来养伤，硬是咬着牙坚持拄着双拐用一条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路上，像这样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还有很多。心中有信仰，脚下就会有力量。这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他们为理想而来，为信仰而战。以这种信仰武装起来的军队，就拥有无法战胜的力量。（摘自2019年7月15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听长征路上的“初心”故事》）

我的父亲李兆麟曾在东北战场为驱逐日寇顽强战斗了14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将领。父亲生于1910年11月2日，原名李超兰，进行抗日救国地下工作时化名李烈生，在参加抗联后化名张寿钱。父亲志向高远，面对国土沦丧、政府无为的严酷现实，一腔热血的他曾在书籍上镌刻下“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八个大字，表达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父亲的战友冯仲云将军曾经撰文评价他：“寿钱在北满享有盛名，人民敬之若神，称为民族英雄、北满抗日统帅。这绝不是偶然的成就，而是由于他在保卫祖国战争中不朽的功勋所得来的。”

少年离家，救国乃第一要务

1930年，父亲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加入共青团。1931年7月，父亲加入共产党。当年年底，父亲受抗日救国会的委派返回东北，到家乡辽阳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辽阳、奉天（今沈阳）、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号召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次年3月，父亲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主持召开了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各队领袖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以小堡为中心，在辽阳、奉天、本溪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

父亲带领的这路抗日队伍不久就攻克桦子沟矿，活捉了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八大矿矿长久留岛。1932年7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父亲又联络奉昇的林子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

回忆我的父亲李兆麟

□ 张卓亚

近万人，于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中的内应协同行动，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坏飞机7架。这一壮举轰动全中国，痛击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1932年冬，由于日寇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义勇军，第二十四路义勇军被打散了，父亲被迫离开家乡辽阳，先后到本溪、沈阳，化名“孙正宗”，在煤矿和伪满军队里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成立了“矿工抗日救国会”，策动伪军起义抗日。1933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父亲受到日伪的追捕，奶奶和姑姑为了掩护父亲而被捕。因为家中无人，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父亲才得以逃脱。之后，党组织调父亲到哈尔滨担任北满省委军委负责人，父亲化名“张寿钱”，参与抗日联军的创建工作。从此，他与家人彻底失去联络，再也没有回到家乡。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正式成立，父亲任代理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行军艰难，抗日热情终如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寇对东北抗联进行了全面围剿，抗联部队损失巨大。1938年11月，党组织决定抗联队伍西征。西征途中，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战士们身上带的

到的送给他一些，但父亲坚持不要。他还忍受着饥饿的痛苦，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的伯夷、叔齐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当同志们情绪低落时，父亲鼓励大家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决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他还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们看咋样？”逗得大家都笑了。就在父亲他们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姓兰的交票员从中苏边境给父亲带来了重要信件，同时，还带来一些炒面和粮食。战士们见到吃的，恨不得一次吃个饱。可是由于长时间挨饿，一旦吃得过饱，就会立即断肠丧命。为此，父亲提醒并监督大家：先是喝稀米汤，然后再慢慢地增加食量，从而挽救了这二十多个战士的性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增兵东北达76万兵力，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为了保存实力，抗联队伍转移到苏联境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十八旅）。在苏联，父亲坚持学习，不时派出小分队回东北打探情报。也正是在苏联，哥哥和我先后降生，按照苏联卫国英雄的名字分别取名为“力克”和“卓亚”，沿用至今。父亲希望我们也能成为对祖国有贡献的人。

斗争中来巩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父亲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的停战阶段。由于特殊环境下的工作，经常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他时时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撕毁停战协议的阴谋，敌人对他又怕又恨，多次想谋害他。但父亲总若无其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文钱？抗战这么多年，都说我是福将，日本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孔，也没碰到我的肉。”他还说：“如果真遇上这事儿，要以我的血换哈尔滨人民不流血，那也是值得的。”没想到，一语成谶。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马迭尔饭店召开了庆祝大会。父亲为大会题词：“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没想到，就在第二天，父亲在赴约时被敌人安插的特务蒙骗，喝下含有氰化钾的茶水，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趁机蹿出，用刺刀、匕首朝他猛刺，将他残忍地杀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中国革命而死难的亲人和先烈们安息吧！（摘自2015年第8期《党的生活》（黑龙江），原标题为《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回忆我的父亲李兆麟将军》）

